

在全国法院案件快速增长、“案多人少”矛盾普遍突出的情况下

浙江各级法院收案数量为何不升反降

本报记者吴帅师

据浙江省高院院长李占国回忆,2018年初刚到任浙江,曾有一组数据令他颇为忧心:作为经济大省,从2007年起,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便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过大数据分析,按照这一趋势,2019年前后浙江全省法院收案量将突破200万件。

但这一势头在2019年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扭转。据浙江省高院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1-11月,该省各级法院收案总量为157.8万件,同比下降4%。

在全国法院案件快速增长、“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普遍情况下,浙江何以出现收案拐点?

法庭助力“枫桥经验”再升级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土办法”成了享誉全国的治理经验。经过50余载传承发展,“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并在浙江基层乡镇村社治理中展现新的活力。

“一次好的调解可能等于疏导化解20余件潜在诉讼。”浙江永康龙山法庭庭长潘文接说。今年年初的一起案件背后,矛盾分层过滤发挥了大作用。

2019年初,龙山镇某村一位村民意外死亡,引发多方遗产纠纷。矛盾发生后,该村支部书记、网格员提前介入及时将情况上报镇综治中心。

当地法庭、党委干部、村书记马上组织各方当事人开展调解。由于法庭提前介入,该案中各

甘肃检察干警『护航』民企合法合规经营

据新华社兰州1月6日电(记者王博、郎兵兵)蒋来彬400多天辛酸追讨路,在检察机关介入下终于告结。

蒋来彬是兰州新区鸿图混凝土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成立5年多,规模不大,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是一家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及建筑材料的小型民营企业。

2017年10月,鸿图公司与兰州新区一项目施工方江苏某建设施工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金额490万元的混凝土供需合同,约定工程完工后付款。然而,约定113天工期的工程却迟迟未能完工。鸿图公司多次催要货款,对方均以“工程未完结”为由拒绝支付。

混凝土生产企业流动资金需求量大,鸿图公司规模又小,建设施工单位拖欠直接导致鸿图公司周转不灵,被迫停止运转。蒋来彬和鸿图公司踏上漫漫讨路。

看似遥遥无期的债务纠纷在2019年迎来转机。这一年,甘肃检察机关组织2855名检察干警登门走访10761家民营企业,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收集企业反映的问题和诉求以及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发现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线索,“护航”民企合法合规经营。

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吴增功在了解蒋来彬反映的情况后,通过调阅纠纷材料、询问当事人、实地走访项目工地、赴江苏调取材料,还原了案件事实。“每次情况有新变化,他们就来找我落实、反馈。单是和我的沟通,前前后后就有六七次。”蒋来彬说。

“经过认真调查核实,我们发现,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的工期是113天。之后,施工单位又私自延长工期,损害了鸿图公司的利益。”吴增功说,依照合同法律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施工单位应按约定偿付货款。

经检察机关协调,两公司达成和解,合同约定的490万元目前已全部偿清。

2019年,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维护民企权益、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检察机关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服务民营企业的重要抓手,通过开展“千人进万企”大调研、大走访、大排查活动,组织检察干警走访本地大中型民营企业,共收集和鸿图公司一样的企业反映的各类问题线索1121条。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丁霞敏说,对收集到的问题线索,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和事项,快速分流到相关业务部门,综合运用检察建议、抗诉、纠正意见等措施,及时办理,限期办结,书面回复;对“融资难”“执行难”等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积极沟通有关方面协调解决;对重点案件和事项,采取各级检察院领导挂牌督办的方式,加大办理力度。

截至2019年底,由甘肃省三级检察机关党组成员挂牌督办的399件涉民企问题线索已逐项清零、全部办结,办理结果反馈涉民企企。

方主体很快达成了协议,并且进行了司法确认。

随着调解深入,法庭庭长提前介入发现这一案件背后可能还暗含了许多潜在法律矛盾:包括子女抚养、公司股东转换、债务问题。

“通过党委领导,法庭全程参与调解,并跟踪当事人后续履行到位,这相当于解决了20多件潜在的诉讼。”潘文接说,融入当地党委政府的社会治理体系中后,法庭从低头办案到功能前置,矛盾纠纷从“定化解解”到抽丝剥茧。

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8年,龙山法庭的案件收案量从2013年的806件下降到2018年的414件,降幅接近5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何鑑伟表示,“龙山经验”背后是人民法庭深度参与基层治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矛盾类型变化,提升基层矛盾化解的专业度、准确度。

潘文接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乡镇的人员结构、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深度变化,这意味着基层法庭不能只“低头办案”,还要将司法服务向前延伸。“用法官、调解员的法律专业性帮助网格员、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成为专业调解力量,用法庭推动‘枫桥经验’再升级。”

让“一家之力”成治理合力

在舟山市普陀区,一幢3层小楼聚集了15个职能部门。与市民服务办事中心类似,这个名叫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机构也推行“一窗受理、一站办结”。“如果说市民办事中心是‘服务超市’,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全科诊所’。”该中心主任缪华杰说。

邻里纠纷、劳资纠纷、行政仲裁……各种类



福建永泰举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1月6日,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公安干警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中向群众介绍专项斗争成果。

新年伊始,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过程中,发挥纪检、政法、公安等职能部门联动作用,建立健全专项斗争长效机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深挖彻查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山西:科技助力斩断程序腐败之手

新华社太原1月5日电(记者孙亮金、胡靖国)2018年以来,山西依靠大数据、信息化等科技力量,重塑“办事流程”,一网通办“颠覆”了传统公安办事模式,在程序上杜绝了滋生违纪违法的“伸手机会”,提升了办事效率,行政成本显著下降。

见网不见人

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担负着重要职责。据山西省公安厅的梳理,在有3600多万人口的山西,仅2017年,就有5000多万人次到公安机关各类服务窗口办理审批事项,人均1.4次。

为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来回跑、不方便等突出问题,2018年以来,山西省公安厅充分运用大数据平台优势,创造性建设开通“一网通办”服务群众、服务企业平台,将群众和企业 在公安机关办理的376项业务转到网上办理。其中服务群众业务270项,服务企业业务106项,95%以上的项目可实现“一次办”,85%以上的数量可实现“一网通”。

“新的办事平台颠覆了公安审批‘套路’。”山西省公安厅负责人说。

首先是“办事场所”从实体窗口转移到了“网上”。山西公安把分散在各级各警种部门,涵盖治安管理、户政、交管等各警种的300多项审

批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实现省、市、县、所队四级受理的全部审批服务事项在后台自动分流、同步审批。

群众的办事则从“去窗口排队”变成了“在家随时办理”,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就可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对能够一网通办的事项,全程在线申请、提交、办理、查询,并根据群众需要,实行证件等快递直达。

程序斩断“贪腐之手”

自2018年6月13日上线至2019年底,山西公安“一网通办”平台开具了1300万份无犯罪记录证明。

“群众在手机客户端‘下单’后,后台直接电子审批,出具一份电子无犯罪记录证明,群众自行下载打印出来即可。”山西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赵永胜说,中间环节全没了,群众根本不用再去找关系求人,杜绝了各级审批者吃拿卡要的机会。

山西省公安厅负责人介绍,“一网通办”平台通过网上办、全程办、限时办,实现整个办事流程的公开透明,群众办事“见网不见人”,民警工作中不见人、不见钱,将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审批权限变为服务职责,从源头上铲除了腐败滋生的土壤。

科技支撑推动治理智能化

李占国表示,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关键在于形成合力,即主动把诉源治理工作融入党委政府领导的治理格局中,推动形成“调解在前,诉讼断后”的工作机制。

借力科技,法律服务得以进一步下沉融入基层治理。在杭州市临安区上田村,原本偏远的村社借助一块屏幕、一条网线和一个终端机,在不建楼房、不增编制的情况下,一个具备人民法庭基本功能的“微法庭”就搭建完成了。

上田村党总支书记潘曙龙说,借助“微法庭”,村干部、法官、当事人可以在线进行调解。“村干部熟悉乡情民俗,法官熟悉法律法规,有调解权威。通过微法庭实现的是‘1+1>2’的效果。”

据了解,目前杭州已设立160余家“微法庭”。除了推动化解传统民事案件、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外,“微法庭”还可以通过庭审直播、失信曝光等实现普法服务;通过设置在村里的终端设备连接“浙江移动微法院”,实现远程立案、在线送达等功能。

除了服务下沉,科技支撑下的法院立案调解同样实现了在线流程再造。据了解,从2018年起,浙江全省范围内上线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目前该平台与法院审判系统已形成无缝对接,网上立案的民商事案件自动推送到在线调解平台,由社会力量诉前化解。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全省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入驻各类调解员超过40000人,累计流转案件58.2万件,调解成功51.5万件。

“全天第一波警情高峰出现在早上8点;上午10点,纠纷类警情进入高位区;下午3点,诈骗类警情达到峰值;晚上10点,侵害人身类警情增加最显著……”1月5日下午,上海市闵行区发布年度“平安指数”,精细化的数据体现出城市管理的“绣花精神”。

平安建设的大数据,催生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各种小细节。2019年,闵行全区110警情总量为48.7万起,同比下降13.3%,与2016年相比,总量更是减少了近25万起。基层治理的创新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区域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疏解交通堵点,物流司机戴上智能手环

闵行区浦江镇有一家快递企业的华东区中转站,周边既有大型居住区,还有商业区、办公园区。这个中转站日均转运货车达到1000余辆,而周边交通状况却相对较好。

以前不是这样。2017年的“双十一”,该区域的货车增加一倍,派出所到园区原本5分钟的车程,接警民警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当月交通类110警情达到了78起。而到了2019年,方圆2公里内已经没有一例关于物流车辆违停、大型车辆积压而引发的110警情。

“实际上,这家物流公司曾计算过如何优化工作流程,最快最经济地将货物送达,但对公共道路占有的评估并不专业。”杜行派出所所长徐忠说,“我们通过图像监控预估周边道路通行数据,和公司一起做好这道应用题。就好比一个蓄水池,我们要控制好进水量,出水量和存储量之间的关系。”

在派出所的指导下,这家物流公司给所有货车安装了GPS,实现对进出货车的实时感知。随后以周边道路的通行情况、不同货物的装卸流程、中转站内的实时停车数等作为变量,计算进出场的最佳顺序和时间。司机则可以通过佩戴的手环收到行驶提示,以此确保货车在任何时段都能处于流动状态。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这套基于数据测算的管理方法取得显著成效,周边道路通行平稳有序,同时,这家速运公司的货车流转速度提高了66%,每辆货车滞留园区的等待时间从10分钟减少至4分钟。根据企业内部统计,从这里发出的快递到达时间平均快了45分钟。

商户“灵不灵”,扫描“二维码门弄牌”

纠纷类警情已经占到闵行区总警情的一半左右。闵行区将所有的纠纷类警情作了分析,发现占据前列的是消费纠纷、物业纠纷、邻里纠纷等。再通过对报警内容的音频分析发现,大多涉及“吃得干净”“乱开价”“噪音大”等。

为了减少纠纷警情的发生,七宝派出所“在大众点评”中得到了启发。他们试图通过公开更多的商家信息,消除信息不对称,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发生。同时,也能借此“倒逼”商家做好服务。七宝派出所将商户众多的七宝老街作为试点,在“二维码门弄牌”上加载了“立码办”系统。群众扫码可以看到各个政府部门对商铺的评价,包括公安、安监、卫计、市场、劳动等部门的执法信息的数据评价。此外,“立码办”系统还有许多人性化功能,比如商家可以用来介绍产品特色,游客遇到迷路、寻人等状况无需报警,输入救助内容,就迅速有人来解决。

2019年,七宝老街的纠纷警情下降了24.9%,15家“问题”商铺易主经营,销售额同比2018年增加了5.5%。

七宝派出所所长金晓东表示,“二维码门弄牌”像是“城市大脑”的神经末梢,架起商户、消费者、政府部门三者间的桥梁,不用面对面就能沟通了解各自的需求。

便利店、门卫室、保安室,变身“安全屋”

2019年6月以来,闵行公安分局虹桥派出所推出了“安全屋”工作举措。

何为“安全屋”?相关部门整合辖区原有24小时值守力量,在便利店、公司门卫室、小区保安室加装“安全屋”灯箱,增添急救、防爆等可移动设备,群众遇到突发状况可以紧急避险。

据了解,虹桥地区有很多企业、商户、社区住宅,这些地方 的24小时安保力量加起来超过2600人,相当于20个派出所民警。虹桥派出所所长魏栋表示,“他们的一些工作内容与我们警方有所交集,只要他们的工作能力升级一点点,整个地区的安保能力就会呈几何倍上升。”

目前,虹桥派出所存在31个“安全屋”选拔了200多名安全员,制作了《安全屋事件处置指引手册》,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掌握一些非报警类警情和吵架争执事件的处置规范和流程。

“这样就解决了群众报警后最没有安全感的真空时间段。即使民警暂时还没到场,安全员也可以开展先期处置。”魏栋说。

据悉,闵行全区已有300余家“安全屋”,24小时值守,不仅增加了周边居民的安全感,降低了警情数量,而且为夜间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本报记者黄安琪、朱翊、许东远)

上海闵行:平安建设大数据,创新治理小细节